

世界华侨史丛书

日本华侨史

罗晃潮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粤新登字 09 号

2054/06

日本华侨史

罗晃潮 著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行信电脑服务部排版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 本 14.75印张 354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7—5361—1458—3/K·54

定价: (平) 15 元
(精) 20 元

编 审 说 明

前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华侨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教授主编的“东南亚华侨史丛书”和“世界华侨史丛书”，是广东省和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作者的努力和出版社的支持下，《菲律宾华侨史》、《印尼华侨史》、《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美国华侨史》已经出版面世，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不幸，先生于1990年5月9日因病逝世。这是学术界的巨大损失，同仁无不深感痛失良师益友。为实现先生的遗愿，使这两套丛书的编审和出版不至中断，经有关人员研究，成立了编审小组，负责推动撰写工作和审定书稿，继续完成先生生前定下的选题。

本书由罗晃潮撰写、徐善福审定。恳切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多多批评指正。

世界华侨史丛书编审组

世界华侨史丛书总序

朱杰勤

世界华侨史丛书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同志们全面的规划和多年的努力，加以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今已陆续问世了。我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受本丛书作者的委托，写一序言，弁于编首。

从历史角度来看，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支，他们也自称为“炎黄子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史或中国史是不能忽略海外华侨在历史上的活动及其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的。我国移民最多时约有三千万人。人数虽不算多，作用相当巨大。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海外华人素有勤劳、勇敢、智慧之称，坚忍不拔之志。一方面，在侨居国中，与当地人民一道，开发资源，建设社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且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支持当地民族独立自主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支持祖国革命运动和社会建设，出钱出力，甚至献身。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值得我们称道学习。在中外关系方面，华侨是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把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播于当地民族，对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在双方交流中，他们也把海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入祖国，经改造后，又充实了我国的文化宝库。由于华侨对世界贡献之大，华侨史的研究自然受到社会的重视。

华侨史有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期。直至50年代，出版的专书有数十种，有独到之处，有开拓之功，为后来研究者大开方便之门，值得称道。不过这些著作成于华侨史研究的发轫时期，受时代所限制，不免有简陋和不足之处。例如有些作者的观点方法不够正确，有大国沙文主义或大汉族主义观点，将华人移居海外类比为西方殖民主义，立论错误。又往往滥用一些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分子歪曲历史真相及华侨形象的言论，而不加批判，任其谬种流传，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我们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并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

新中国成立后，侨务部门重视海外华侨，制定华侨政策，并提倡对华侨问题的研究。由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中国和外国关系更为密切，作为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华侨史也逐渐受到国内有识人士所重视。学术界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首先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处理 and 解决华侨历史上的问题，如实地反映历史情况。并注意有关资料的发掘和搜集，重视调查研究，凡中外文献资料、档案文件、考古文物以及口述史料，都在搜罗之列。他们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批判工作，从中得到科学的结论。当时，华侨史研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及研究成果方面，都有所提高。“文革”十年动乱期间，一切科研工作几乎陷于停顿。华侨史研究亦难以进行。直至拨乱反正之后，才有起色。这是与政府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和落实华侨政策的种种措施分不开的。从1976年开始，华侨历史研究确有很大发展。例如成立较早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都投下较多的力量从事东南亚华侨史的研究，出版物亦多。云南东南亚研究所则以泰缅华侨史为研究重点；广西印支研究所

和民族学院则以印度支那华侨史作为重点,均有刊物和专书出版。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和东语系都分别拥有大批专家学者从事华侨史研究,成绩显著。此外,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上海华东师大等校都成立华侨史研究室,都有研究成果问世。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于1981年7月由教育部批准成立,是第一所专门研究华侨的学术机构。亦以华侨史为重点,有《华侨史论文集》及《华侨史丛书》等出版物。

1981年12月,全国华侨历史学会在北京成立,影响所及,风气大开,全国各省市和侨区侨乡纷纷成立华侨历史学会,几乎都有刊物出版。华侨史研究逐渐具有群众性基础,蓬蓬勃勃,方兴未艾。今天华侨史研究工作者已不限于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还有大批归国华侨参加。卓有成就的海外华人学者,对国内华侨史研究亦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作用。他们用外文写的华人史专著已有多种在中国被译成汉文出版。双方学术交流可以收到互相切磋之益。

综上以观,近十年来,华侨史研究的发展颇为迅速,研究队伍亦空前壮大,研究成果亦日新月异。但华侨史研究范围甚广,内容又多,其中有些空白点要我们填补,也有不少历史问题待我们解决,研究成果还要精益求精。目前已出版的华侨史种类不多,个别华侨史寥寥可数。世界华侨史还在草创之中,还须不断努力。过去研究华侨史的人,大多数以东南亚华侨为研究对象,而很少涉及其他有众庶华侨的国家和地区。这是不能全面反映世界全体华侨的历史真相的。我们希望学术界多写一些世界五大洲主要国家的华侨史行世,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写成一部内容丰富,观点正确,有独到之处的世界华侨史出版。

编写一部名符其实的世界华侨通史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有坚强的组织领导,切实可行的计划,充分的准备,足够的经费,发

挥集体力量，团结专家学者，分工合作，假以时日，持之以恒，十年之内，可望完成这项重大工作。世界华侨史的编写，最好取材于各国华侨史，触类旁通，才能事半功倍。由于已出版的各国华侨史种类不多，遂使编写世界华侨史的人难以搜集有关的参考资料。这恐怕是世界华侨通史至今尚未出现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目前还须加强各国华侨史的研究、编写和出版的工作。

我从事史学研究已有五十五年了。少年治中国史，中年治世界史，晚年以中外关系史研究为归宿。华侨史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中外关系史时，不能不加以注意。由于中外关系史范围很广，我必须统筹兼顾，未能全心全意投入华侨史研究，偶然发表一些论文，也是一时兴到之作，充其量亦不过一知半解而已。有些同志误以为我专治华侨史，并以此相推。有关领导方面谬采虚声，竟以主持华侨史研究的任务见委：如主持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主编东南华侨史丛书和世界华侨史丛书等等。我默念华侨史研究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它是具有国际性的传统学科，在新的历史时期意义尤为重大。惟有兢兢业业，勉为其难，努力以赴，以塞众望。

世界华侨史丛书是世界各国华侨史的汇编，丛书的撰述都是由熟悉业务，能运用当地语言文字，有史学修养的研究经验的学者担任。他们慎重其事，尽力而为，成书之后，犹反复修改，然后定稿，又迭经丛书的主编审阅修订后，交上该书的责任编辑审阅并提出意见，再由作者补充修改而后定稿，最后还要经编辑部 and 出版社领导审议，认为符合出版要求才能出版。每一种书，从创作到出版，往往要经历三年以上的时间，作者、编辑和出版社的同志都要付出或多或少的辛勤劳动，如果没有多方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这部丛书的编写和出版计划是不能实现的。

今天世界华侨史丛书得以问世，这与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作

者们的苦心孤诣是分不开的。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积极提倡文化事业，重视华侨历史研究，慨然承担丛书的出版任务，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也推动了华侨史研究的发展。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古语有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事实上确是如此。这部丛书的主编和作者在华侨历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丛书中的作品自然也有许多缺陷和错误，我们恳切希望国内外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1988年于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前 言

日本是一个位于亚洲东部的岛国，大小岛屿三千多个，共约36.9万多平方公里，最大的本岛有四个：九州、四国、本州和北海道。日本四面环海，北临鄂霍茨克海，西抱日本海，与朝鲜半岛隔海为邻，最接近处的对马海峡为古代中日交流最早的通道，东南面环太平洋，西南面隔黄海、东海与中国遥遥相望。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条载：“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后来“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一般史家认为，这个“平原广泽”就是日本纪伊半岛上的熊野滩内檀原地方。可以说这个徐福东渡的传说便是我国人民最早移住日本的记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我国政局的动荡，又一次出现东渡的浪潮，日本古史中屡有所谓“秦人”、“汉人”和“新汉人”的记载，便是指这一时期以弓月君、阿智王、安贵公为代表东渡日本的中国移民集团。由此可见，隋唐以前的中国人民是以集团移民的形式移住日本的，这是与当时两国历史发展的背景相适应的。

隋唐以降，中国人前往或旅居日本已不再采取集团移住的形式，而是以商人和僧侣为主，前往从事贸易和弘扬佛法，此外还

有一些出使日本不回，或受聘于日本的专业技艺人员侨居下来，他们已具有商旅和侨寓性质。其中有些人定居下来甚或加入日籍，如公元 874 年“六月十三日，大唐商人崔岌等三十六人，抵肥前国松浦郡海岸，七月十八日敕准援归化例安置供给”（《三代实录》卷二十六）。

至宋元两代，旅日华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年来到日本的华侨大都聚居于今福岡市的博多，并以北九州为中心，活跃在整个九州地区的福岡、长崎、大分、熊本等县，甚至远达越前、镰仓。到 12 世纪 50 年代，来到博多的华侨人数达到最高峰，在那里居留的宋人就有 1600 余家。根据日本《石清水文书》的记载，当时在博多的笏崎宫前一带，居住着很多宋人，形成了一条唐人街，他们按照祖国的宗教和风俗习惯在街中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的房屋和祠堂，当时称为“宋人百堂”。可以认为这时日本的华侨社会已开始形成了。

明末清初，旅日华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中国正处于改朝换代之际，政治混乱，社会动荡，沿海不少百姓东逃日本，一些不甘事清的明遗民和郑成功的余部也纷纷来到日本。他们多数与原在日本经商的明朝商人聚居于长崎。至 17 世纪，长崎已居住着不少华侨。1613 年，江户幕府严禁天主教，广大华侨为了表明信仰，免受株连，1623~1678 年，先后兴建了兴福寺（俗称南京寺）、福济寺（俗称漳州寺）、崇福寺（福州寺）、圣福寺（广州寺），合称“唐四福寺”，作为同乡侨胞礼佛祭祀和联谊的地方。至 17 世纪中叶，长崎的华侨已以地缘和方言为基础，以“四福寺”为中心形成了各自的乡帮团体。17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开放海禁，到长崎贸易的清朝商人逐年增加，1688 年已达 9128 人，可见当时中日贸易和长崎华侨社会的繁盛。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此后旅日华侨便进入了近代的历史

发展时期。随着日本的神户、大阪和横滨等港口城市的开拓和发展，旅日华侨也纷纷从国内和长崎来到这些港口城市，特别是1874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以后，华侨人数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各地的华侨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侨团除了为同乡聚会提供活动场所之外，还发挥了商业协调和经济调解等作用。这样，近代日本华侨社会便很快形成，并出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只是后来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实行矛头指向中国的大陆政策，自中日甲午战争起的三四十年间发动了多次直接侵略中国的战争，才使发展中的华侨社会得不到稳定正常的发展，而随中日关系的好恶处在动荡不定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大变，旅日华侨以战胜国的侨民身份得到一定的优待，华侨社会也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无论是华侨经济、华侨社团组织等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华侨为顺应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潮流，以及战后世界华侨社会的演变，正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而向前发展。

纵观日本华侨历史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华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最初是以集团移住为主而被称为“秦人”、“汉人”或“归化人”。到隋唐两代，居留日本的既有“归化人”及其后裔，也有侨居的商人、僧侣、工匠，但后者人数还不是很多。到了两宋时期，侨居日本的宋商、工匠、僧侣，以及志士仁人，比隋唐时代大增，他们主要聚居于博多，并形成成为一个社会，可以说这是世界华侨史上最早出现的华侨社会。虽然日本华侨的出现及其社会的形成都是最早的，但由于日本的社会、历史、民族等特殊条件，华侨在当地所占的地位和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最小的，华侨社会不仅始终未能发展和完善，而且往往随着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或由于中日交恶，或因国内锁国政策的加强而丧失活力，甚或日渐式微，这也是日本华侨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

其次，日本华侨社会与东南亚华侨社会相比较，属于不同的类型。它们从一开始便按着各自的轨道向前发展，无论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且越到后来差异越大。日本的华侨社会远较东南亚的华侨社会更为稳定，更具有“侨”字的含义，因而一直到今天在各方面仍保持有较多的民族性，如一些风俗习惯仍一直流行，侨校中仍以进行爱国的民族教育为主，所以当东南亚的华侨社会已成为华人社会时，它仍然被公认为华侨社会。不过，事物是不断运动发展的。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对外侨政策的转变，日本的华侨社会也将会沿着华侨华人社会方向发展。

1992年4月，江泽民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二千多年的交往中结下了浓厚的情谊，也出现过不幸的历史时期”（1992年4月8日《人民日报》）。毋庸置疑，研究中日两国交往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可是对作为中日交流的重要桥梁——旅日华侨及其历史的研究，可说迄今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探索。本书的编撰只不过是一次初步的尝试而已。

本书编写从资料的收集、写作大纲的订定到写作过程中疑难问题的解决，都经常得到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教授生前的谆谆教导，而不幸在本书出版的今天，先生却已离我们而去。作为他的学生，我一直得到先生的栽培和奖掖。本书得以写就，也是在先生的精神鼓舞和激励下完成的。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日本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德仁先生、兵库县广东同乡会会长陈因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他们以神户中华总商会创办的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名义邀请我赴日考察研究，使我不仅收集了不少宝贵的资料，而且也对日本华侨社会有了感性认识和进一步了解，得益匪浅。在本书出版之际，谨

向两位陈先生和神户中华总商会再次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编写和资料收集，还得到暨南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东南亚研究所资料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以及东京学艺大学海外子女教育中心、神户中国资料馆、长崎孔子庙中国历代博物馆等单位的支持；同时，还得到日本华侨界林同春、李万之、马广秀、曾健卿、符顺和、官文秀、黄禹生、潘来日、霍兆翔、金翔诸先生和游仲勋、许淑真、钟清汉、过放诸学者，以及日本友人西村俊一、松浦章、长谷川善计、安井三吉、泽田雅利诸教授的帮助，谨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由于作者的学识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行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作者

1992年4月

于暨南园

目 录

世界华侨史丛书总序	朱杰勤
前言	(1)
第一章 秦汉时期日本的中国移民	(1)
第一节 最早的中日交往	(1)
第二节 徐福东渡的传说——日本最早的中国移民	(4)
第三节 两汉时期的中日交往	(9)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入日的秦人、汉人及其贡献	(15)
第一节 曹魏与女王国(邪马台国)的往来	(15)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与大和朝廷的交往	(18)
第三节 移住日本的汉族“归化人”及其活动	(21)
第四节 入日秦人汉人对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贡献	(26)
第三章 隋唐时期日本的汉人后裔及渡日唐人	(31)
第一节 中日交往的新时期	(31)
第二节 6~10 世纪日本的华侨华人及其活动	(35)
第三节 6~10 世纪日本华侨华人对中日文化交流	

和日本社会发展的贡献	(50)
第四章 宋元时期的中日关系与华侨	(60)
第一节 五代十国与两宋时期的中日关系	(60)
第二节 活跃的侨日宋商、僧侣和工匠	(63)
第三节 宋人百堂——日本最早的唐人街和华侨 社会的出现	(65)
第四节 两宋时期旅日华侨对日本社会发展 的贡献	(72)
第五节 元代的中日关系与华侨	(79)
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中日关系与华侨 (上)	(87)
第一节 明代至清前期的中日关系	(87)
第二节 16~17 世纪初九州华侨的活跃及其原因	(90)
第三节 17~18 世纪长崎的华侨社会及其演变	(97)
第四节 17~18 世纪日本华侨增加的原因	(104)
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中日关系与华侨 (下)	(110)
第一节 长崎华侨的后裔——唐通事和通事会馆	(110)
第二节 长崎华侨华人的名流大族	(117)
第三节 17~19 世纪中叶的侨日高僧和唐 “四福寺”	(126)
第四节 侨生郑成功及郑氏一族与日本华侨	(141)
第五节 侨日明儒朱舜水与日本华侨	(153)
第七章 19 世纪中叶至抗日战争前的日本华侨 (上) ...	(176)
第一节 “安政开国”与“无条约国”的清商	(176)

第二节	《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与近代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	(180)
第三节	日本的外侨政策与华侨的人口·····	(184)
第四节	华侨的经济活动和变化·····	(196)
第八章	19 世纪中叶至抗日战争前的日本华侨 (下) ···	(236)
第一节	日本华侨的社团组织·····	(236)
第二节	日本华侨的教育事业·····	(260)
第三节	日本华侨的华文报刊和文化出版事业·····	(269)
第四节	日本华侨与中国民主革命·····	(282)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华侨·····	(314)
第一节	旅日华侨的艰难处境·····	(314)
第二节	抗日时期旅日华侨的经济概况·····	(320)
第三节	日本华侨的社团和学校·····	(324)
第四节	华侨在日本的爱国反日斗争·····	(327)
第五节	华侨青年、留日学生和中共东京支部的反日斗争·····	(330)
第十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华侨·····	(336)
第一节	战后日本华侨的人口状况·····	(336)
第二节	战后日本华侨的职业和经济·····	(354)
第三节	战后日本华侨社团·····	(373)
第四节	战后日本华侨的教育事业·····	(392)
第五节	战后日本华侨的新闻与文化事业·····	(397)
第十一章	冲绳华侨概述·····	(417)

第一章

秦汉时期日本的中国移民

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古老国家，是“一衣带水”、“一苇可航”的邻邦，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可以上溯到很早的年代。

第一节 最早的中日交往

中日文化渊源

根据地质学家的考察，在地质年代第三纪，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东部是相连的，随着第四纪的火山运动和冰期变动，到了阿尔卑斯造山运动时才与大陆分开。再从考古研究来看，到目前为止，在日本发现的时代较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般都认为与东亚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有密切关系。如在九州东北部早水台遗址出土的石器，就与中国周口店第十五地点的石器具有许多共同性和一致性^[1]；而日本的稻作农业的传入，也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大陆同日本列岛之间旧石器技术文化有紧密联系，日本的远古技术文化渊源于中国大陆。随着人类的进步，社